

任 桐 著

徘徊于民本与 民主之间

《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
述评 (1927—1937)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任 桐 著

徘徊于民本与 民主之间

《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
述评 (1927—1937)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任桐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5

ISBN 7-108-02073-4

I. 徘徊… II. 任… III. ①大公报-政论-研究-1927~1937②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1927~1937
IV. ①G219.296②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0703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200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1/32 印张9.25
字 数 212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18.00元

总 序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决定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合作，连续出版本学科教师的科研成果和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对于繁荣学术事业，促进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推动本学科的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著名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所大学都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传统。早年，陈恭禄、郭廷以、罗尔纲、王栻等著名的史学大师，曾在这里执教。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有着积极的学术影响。他的近代史史料学研究，帮助许多学子训练了扎实的基本功。罗尔纲教授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他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郭廷以教授去台湾后，培养了一代学术精英，活跃于台湾史坛。王栻教授的维新运动史与严复研究，在学界很有影响。毫无疑问，陈恭禄等教授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前驱和开拓者。他们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和学术风范，也奠定

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研究突飞猛进，学术事业更加繁荣。茅家琦教授执本学科牛耳，带领全体教师，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严谨、求实、勤奋的学术精神，锐意进取，不断创新，逐步形成本学科新的研究特色和学术风气，并在若干个研究方向上，跨入学术界前沿。主要研究方向有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近现代中国社会史、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近现代中国经济史、长江下游城镇经济发展研究、近代秘密社团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当代台湾研究，等等。

晚清与太平天国史，是本学科的优势。茅家琦、方之光、崔之清教授，继承先辈成就，利用南京的地缘特点，将这一研究方向推向学术界前沿，获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等。展示了太平天国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具有强烈的学术影响，本学科遂成太平天国史研究之重镇。

近代秘密社团研究，是本学科的又一特色。蔡少卿教授带领一批研究生，不仅对遍及大江南北的哥老会、天地会、红枪会等民间秘密组织一一做了探讨，提出了有价值的成果，还将研究视角转向当代黑社会研究，从一个方面为改革开放和实现国家社会的稳定，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省有关部门敏锐地觉察到当代台湾研究的重要性，多次建议南京大学成立台湾研究所，可是迟至1991年才正式建成。当时，茅家琦教授曾动员我和他一块儿去开垦这一领域。可是我仍留恋于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未为其所动。茅家琦教授乃

带领一批研究生写出了颇具影响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和《80年代的台湾》两部著作。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在崔之清教授的积极推动和指导下，培养了大批博士生、硕士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活跃在全国各地对台工作的岗位上。南京大学的涉台研究，为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咨询，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华民国史，是本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目前正在整合本学科的主体力量，形成更为强大的学术群体，以发挥集体优势。

1971年周恩来总理即再次号召研究中华民国史，1972年，李新教授率先在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民国史研究室，开始着手研究民国史。翌年，李新教授派尚明轩研究员等来南京大学找我，协商共同参与民国史的研究活动。当时，尚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仍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但是，我们凭着追求学术真理的愿望与信念，积极地予以响应。南京曾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丰富的民国档案图书资料，完全有条件大力开展民国史研究。我们在艰难局面下，逐步引导教师投入民国史研究，并从最初的单纯研究民国人物，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展开。1983年，在历史研究所内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它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最早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1984年，南京大学与兄弟单位共同发起召开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海内外特别是台湾引起了强烈反响，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涉足民国史研究。次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纲》，在无任何范例借鉴情况下，初步勾画了民国史的学术框架和体系，在众多的历史问题上依据第一手档案，提出新的观点和解释，在国内外学术

界产生了良好影响。史全生教授在民国经济史、文化史研究领域颇具造诣，其研究成果，对民国史方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93年6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心”的主旨在进一步提高民国史研究学术水平，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学术联系与交流。“中心”聘请了海内外一批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为客座教授，出版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刊物《民国研究》，承担了一批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主办过多次民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先后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蒋介石全传》（上、下册）、《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及《中华民国史丛书》等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2000年9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通过了教育部派专家组考察与评审，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研究项目、经费和人才培养方面，均获得重点扶持。在教育部社政司、南京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本学科教师共同努力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正在稳步向前发展。我们以承担多项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或重大攻关项目为契机，积极调整、整合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力量，并吸收海内外学者来“中心”兼职，在中华民国史领域内开展更为广泛的学术研究，以期出现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围绕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力求在若干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其中，我们在政党社团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方面，摆脱纯发展史的研究局限，着力研究该党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演变，研究该党的政治理念与党务运作。在经济史的研究方面，把重点转向长江下游中等城市现代化研究、农村社会变迁研究。西部开

发，在民国时期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此，我们开展了抗战前后国民政府西部开发政策研究，试图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中外关系方面，研究的方向有所侧重：以西藏问题为焦点，研究民国时期的中英关系；以抗日战争时期华东地区的日伪关系、日军南京大屠杀为重点，研究中日关系的演变；我们还涉足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在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我们的研究重点围绕着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思潮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展开。在人物研究方面，对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等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进行了全面的评价，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跳出了传统的模式。

在取得上述重要科研成就的同时，本学科的队伍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他们思维敏捷，眼光敏锐，善于思考，勤于笔耕。部分中青年教师，以其优异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已崭露头角，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世纪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体。他们分布在各主要研究方向，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方面承担了主要工作，有力提升了学科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最近，本学科获评江苏省学科梯队，就是突出的例证。在民国史领域，有陈谦平、陈红民、朱宝琴、申晓云教授；社会史、思想史领域，有李良玉、胡成教授；晚清与太平天国史领域有张海林、朱庆葆教授；当代史领域有高华教授。此外，还有一批博士、博士后学者加入学科队伍，他们学术素养优秀，知识面广博，且各有专攻，充满朝气与活力，成为本学科的生力军，显示本学科的队伍建设已经形成世代传承、不断发展与创新的优化机制，从而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借研究成果出版的机会，回顾本学科走过的漫长历程，我们一方面为师生们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深切体会到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学术研究领域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不进步不提高，就意味着落伍和倒退。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序 言

方汉奇

《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历经英敛之、王郅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合组的新记公司和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组建的《大公报》董事会等4个时期，先后出版过天津、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北京等7个版，总发行量一度达到过20万份，至今它的香港版还在继续出版，是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

《大公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和如此高的声望，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第一，它是一家爱国的报纸，从英敛之创办之日起到现在，这家报纸始终以爱国为其宣传报道的主线，始终以振兴中华、救亡图存为其言论的基调。抗战时期坚持抗日，到香港出版后又坚持爱国爱港，殷殷之情，一以贯之。第二，它是一家重视报格，严于律己的报纸。《大公报》报名中的“大”和“公”两个字，就是这种报格的具体体现。创办人英敛之对这两个字的解释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

公”。新记公司接办后，又由张季鸾出面，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简称“四不”的社训。所谓“不党”，指的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所谓“不卖”，指的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所谓“不私”，指的是办报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所谓“不盲”，指的是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第三，它是一份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报纸。在旧中国，《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是和上述的爱国感情，“忘己”“无私”的“大”“公”精神和“四不”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第四，它是一份有较高文化品位的报纸。这家报纸有很好的领头人，又集聚了一大批才华出众、品学兼优、非常敬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办报的斡轮老手，既能自己编写，也善于利用社会上的力量。它的“社评”、“通讯”、“星期论文”和“副刊”，被称为《大公报》的“四绝”，深受读者的好评。

在政治倾向上，《大公报》属于“中间势力的报纸”。这个“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个“中”，也就是“敌、友、我”中的那个“友”。在几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它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曾为争取《大公报》做过大量的工作。毛泽东曾经给随团访问延安的《大公报》记者以很高的礼遇，在欢迎宴会上延入首席，并称“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看”。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曾3次和《大公报》领导人长谈，并亲到《大公报》社赴宴，宴毕还为《大公报》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题词。周恩来则经常与《大公报》领导人有信件来往。中共在和《大公报》交

往期间，既有团结，也有斗争。斗争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团结。作为“中间势力的报纸”的一个代表，《大公报》有过动摇，有过分化，站错过队，说过错话。但在国民党严密封锁和控制的情况下，也为公众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红军、解放军、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的报道，为国统区老百姓的疾苦鼓呼请命，为共产党说过不少公道话。并且最后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边，呼唤和歌颂了新中国的诞生。

受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曾一再受到贬抑。它的头上被加强了不少恶溢，它的身上被泼了不少污泥浊水。这些恶溢和污泥浊水，有的是批判者无端加上去的，有的则是某些《大公报》人迫于形势自己给自己扣上和泼上去的。拨乱反正以后，不少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包括一些老《大公报》人，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这份报纸的历史，评鹭其功过得失，使《大公报》重新恢复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偏于革命和进步报刊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党报党刊史的研究，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因此而忽略了“中间势力”报刊的研究，这就有点美中不足了。所谓的“中间势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即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是不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选集》2卷783页）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中的那个大头。中国革命之

所以取得胜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把“中间势力”拉了过来。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必须研究中国“中间势力”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共产党与“中间势力”之间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的历史。同样，研究中国的新闻史，也必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中间势力”报刊的历史。《大公报》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家。

基于以上的认识，近十年来，已有不少关于《大公报》的著作问世。举其大者有周雨的《大公报史》，方蒙等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王芝琛的《百年沧桑》，王芝琛、刘自立合编的《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和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等。其中，吴廷俊的著作还获得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荣誉奖吴玉章奖的新闻学一等奖。

任桐同志的这部《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则是有关《大公报》史研究的又一部新著，是对《大公报》进行深度研究的又一个新的成果。对它的出版，我乐观厥成。相信它将进一步推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中间势力”报刊的研究，并将为关注这方面研究的读者和后续的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2003年7月7日于北京

目 录

总序	张宪文	I
序言	方汉奇	1
第一章 传播政治改良思想的《大公报》		1
第一节 泛政治化的民营报纸		2
一、从英记《大公报》到新记《大公报》		2
二、《大公报》的历史定位		6
第二节 践行中国化自由主义的大公报人		10
一、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特征		10
二、大公报人的自由主义办报理念		17
三、报界自由主义的传播者与最后守望者		21
第三节 由发展迈向鼎盛的十年：1927—1937		27
一、统一·民主·救亡的时代主题		27

二、政治改良思潮异彩纷呈	37
三、《大公报》：从华北大报到全国舆论重镇	48
第二章 解读和平裁兵思潮：立言文武从	56
第一节 阐发和平理念与仁政思想	57
一、主张文武武从，抨击军阀政治	57
二、主张文武武从，诉求党治政府	62
第二节 发起裁兵宣传周	67
一、契合主流政治文化的裁兵宣传	67
二、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的裁兵言论	72
第三节 主张废除私兵，实现军队国家化	76
一、呼吁裁兵首裁私兵，彰显爱民之义	76
二、呼吁构建新型国防，凸现民众责任意识	79
三、编遣流产，大公报人裁兵初衷依然	82
第三章 解读乡村建设思潮：主张废除苛政	86
第一节 首倡农村实地调查——以苛捐杂税为例	87
一、开报界关注乡村风气之先	87
二、极尽鞭挞苛捐杂税之能事	90
三、切中解决农村问题之要害	95
第二节 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救济农村言论	99
一、副刊为乡建运动推波助澜	99
二、言论以民本思想为基点	103

第三节 策划“陕赈周”与“救灾日”	108
一、两次大规模的募赈宣传	108
二、提倡道德关怀与政治改造并行的赈灾言论	113
第四章 解读人权法治思潮：吁求自由民主	120
第一节 “四不”社训与倡导言论自由	121
一、“四不”社训及其缘起	121
二、系统阐释言论自由	124
三、言论自由的实践与局限	130
第二节 追求生存保障：由激进到平和	132
一、由《党祸》论及保障生存权	132
二、以训政约法诉求保障生存权	138
三、对民权保障同盟的低调宣传	142
第三节 为国民会议与训政约法鼓呼：以人权为基点	145
一、人权传统的误读与人权追求的体现	145
二、对国民会议职能的不同阐释	148
三、对制定训政约法的始终坚持	153
第四节 为开放党禁与民主宪政造势：以法治为目标	159
一、“一党主政”式的开放党禁主张	159
二、以法治为依归的民主宪政追求	165
第五章 解读集权主义思潮：倡扬国家中心	173
第一节 “星期论文”的第一次论争	174
一、“民主与独裁”论争的又一主阵地	174

二、论争各方的现实目标与价值追求	179
三、《大公报》：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	182
第二节 贤能政府的一贯诉求	184
一、中西合璧的政治改良主张	184
二、建言推行高效廉明之政治	188
三、吴鼎昌入阁与大公报人眼中的“人才内阁”	192
第三节 西安事变中的拥蒋立场	196
一、颇具社会影响的拥蒋社评	196
二、以民族救亡为出发点的拥蒋言论	201
第四节 国家中心论的发轫与形成	206
一、从拥护国民政府到拥蒋的国家中心论	206
二、国家中心论的演进与发展	213
第六章 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	217
第一节 “明耻教战”式的抗日策略	217
一、对日缓抗认识与“明耻教战”策略	217
二、“明耻教战”与“不抵抗政策”的本质区别	223
第二节 弘扬团结建国的民族复兴精神	228
一、主张精神、物质、政治建设齐头并进	228
二、主张有条件地团结共产党	234
三、颂忠勇贬奸伪不忘改良政治	239
结语	248